

中国 文化史

THE
(三)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张维青 高毅清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K203

24

3

中国 文化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三

高 张
毅 维
清 青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10241

目 录

第七编 宋：精致秀雅的审美趋尚	1
上卷 内忧外患与缜思哲辩	3
第一章 国政盛衰	3
第一节 初建与稳定	3
第二节 改革与发展	19
第三节 腐败与衰退	33
第四节 和安与没落	37
第二章 世道运脉	49
第一节 宋代经济的态势	49
第二节 北宋经济的新兴	56
第三节 南宋经济的繁荣	73
第四节 顺应经济的思考	82
第三章 科举教化	84
第一节 文治的政策与措施	84
第二节 官学的兴起与定型	92
第三节 科举的完备与效应	99
第四节 教育的推进与变化	102
第四章 理学构建	108
第一节 动态与潮流	108
第二节 分立与融合	120
第三节 传续与集成	126
第四节 挫折与昌盛	140
下卷 尚义重理与别情雅趣	145

2 中国文化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第一章 诗文机锋	145
第一节 华靡隽秀	145
第二节 革弊鼎新	149
第三节 标奇立异	159
第四节 爱国救亡	165
第二章 词调情感	179
第一节 婉约清丽	179
第二节 豪放典雅	189
第三节 凄楚悲愤	199
第四节 清空峻朗	207
第三章 书画高致	211
第一节 历史与风俗	211
第二节 青绿与水墨	222
第三节 精丽与淡逸	239
第四节 尚意与抒情	248
第四章 市井杂趣	256
第一节 习俗	256
第二节 宗族	263
第三节 节会	267
第四节 艺事	280
第八编 辽夏金元：农耕野牧的冲突融会	287
上卷 朔方的骠悍与华夏的宽宏	289
第一章 北风南侵	289
第一节 蒙古崛起	289
第二节 蒙古建元	296
第二章 夷俗汉化	306
第一节 汉制初行	306
第二节 儒学张大	312

第三节 根性难除	315
第三章 经贸拓展	319
第一节 历史进程	319
第二节 时代特点	322
第三节 农牧经营	327
第四节 工商贸易	332
第四章 宗教传承	338
第一节 萨满教	338
第二节 佛教	343
第三节 道教	353
第四节 伊斯兰教	366
第五节 基督教	371
下卷 文化的内张与科技的外延	378
第一章 文教滋养	378
第一节 文治改化	378
第二节 儒统传承	383
第三节 兴学重教	397
第二章 曲苑新风	409
第一节 曲之缘起	409
第二节 曲之繁胜	414
第三节 曲之艺境	425
第三章 画坛异貌	434
第一节 审美之掇变	434
第二节 人物之复古	448
第三节 山水之逸趣	453
第四节 花鸟之抒怀	463
第四章 实学并起	467
第一节 天文	467

4 中国文化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第二节	地理	469
第三节	数学	472
第四节	农学	473
第五节	建筑	476
第六节	水利	479
第七节	医药	482
第八节	手工业	487

第七编

精致秀雅的审美趋尚



上卷 内忧外患与缜思哲辩

第一章 国政盛衰

第一节 初建与稳定

晚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王朝频更的形势，到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出现了重新统一、渐趋稳定的局面。赵匡胤（927～976年）本为后周的一员高级禁军将领，在周世宗去世前以殿前都点



宋太祖像

检掌握了后周最重要的军权。959年，周世宗柴荣溘然病逝，年仅7岁的柴宗训在宰相范质的扶佐下继位。960年正月，边镇急报北汉会同契丹南侵，范质不辨真伪遂派赵匡胤率兵北上拒敌。当赵匡胤率兵至陈桥驿时，由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等将士将事先准备好的皇帝龙袍加于赵匡胤身上，并一起跪拜在地高呼

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兵变后，即挥师复归京城开封。驻守京城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早已得知兵变消息，况且又是早已归附赵匡胤的“义社兄弟”，所以兵变大军一到即开门迎接。这时后周宰相范质才恍然大悟，无奈大势已去后悔莫及，只得随其他大臣尊赵匡胤为君，并帮助赵匡胤登基，行禅代礼。赵匡胤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后周灭。因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故定国号为宋，又改年号为建隆，定都开封，开国皇帝赵匡胤也被后人尊为宋太祖。

赵匡胤建宋后很注意局势的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恩威并施的手段。如后周的太后、幼主受到优厚的待遇，后周的宰相范质等文臣武将都继续留用，就是为后周殉职的韩通也追赐为中书令给予厚葬。这样，就得到了后周在朝文武官员的支持，连拥兵在外的一些将领也甘心归服。但是也有不愿降服的。如昭义节度使李筠于四月间在潞州举兵反宋，但在宋军强大攻势下六月即兵败自杀。李筠败后，原想代周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于九月据扬州起兵，赵匡胤亲率大军于十一月直取扬州致其全家自焚。此后，一些弱小的后周残余势力更无力抗宋，赵匡胤基本奠定了政权更迭后自己稳固的地位。

赵匡胤靠禁军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后，深深懂得兵权对于政治统治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兵权的控制方面也就煞费苦心。在宋朝初建的第一年内，赵匡胤对支持兵变的将领都加官晋级，如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赵匡义、赵普、慕容延钊、韩令坤等。此行赏封官之举既取信于将帅，满足了他们贪求富贵的欲望，又大大加强了中央的统治，稳定了宋初的政局。但当建宋第二年，赵匡胤确认自己的统治已稳固时，就立即着手逐个解除这些高级将领的兵权。在赵普的出谋划策下，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赵匡胤很好地解决了高级将领

的兵权问题。他软硬兼施地告诫将领们：做天子不如做节度使快活，因为皇帝的宝座人人都想坐，即使你们不想而你们部下难免没有异心，因而不如释去兵权，出守藩镇，多积金钱，多置田产，歌舞相娱，饮酒作乐，这样君臣之间不就相安无事了吗？果然，为赵匡胤建功立业并被加官进爵的将领们马上称病提出辞呈，赵匡胤也非常高兴并厚加赏赐。这样，在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等人被解除兵权后，赵匡胤另选一些资历浅、威望低、容易驾驭的人充当禁军将帅，使军权集中于皇帝，也消除了反叛的隐患。

宋太祖赵匡胤在有效解决了内部稳定的问题后，即考虑消除割据、统一天下的治国大计。根据当时北方兵力强大和南方经济富庶的形势，宋太祖定下了先攻取南方再平定北方的战略方针。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利用荆湖地区藩镇的矛盾果断出兵，不久就扫平荆湖一带的割据势力而占据中南。然后宋太祖由中南发兵攻取后蜀，后蜀国主孟昶眼看兵临城下无奈投降。其后宋太祖又举兵攻南汉，过南岭，占韶州，逼广州，南汉大势已去，只好降宋。宋灭南汉后，南唐恐惧，李煜向宋上表，乞求削去国号。宋太祖当然不能允许南唐这样的割据大国存在，遂于开宝八年（975年）十一月攻入金陵，李煜降，南唐平。其后吴越王钱俶对宋惟命是从，仅保留一个国王的虚号而已。这样，南方的割据政权相继被消灭，宋朝又把主要兵力转向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但是就在宋太祖刚要进行大规模北征时却突然死去，这副重担就落在了年富力强的宋太宗赵光义肩上。赵光义（939～997年），原名赵匡义，即位后改名炁。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划者，建宋后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后又加封晋王。976年，太祖死，太宗立。978年，他迫使吴越王钱俶削去国号，献所据十三州之地归降，这样就完全统一了南方。此后，他挑选精兵强将，加紧军事训练，并于979年春率兵亲征北汉。北汉皇帝刘继元见大军压



宋太宗像

境，急忙向辽求援。辽一面派使者来宋说情，一面派军队支援北汉。宋太宗断然拒绝了辽的无理要求，同时也以伏军将援助北汉的辽兵彻底击溃。太原城在宋军的围攻下渐渐支撑不住，只好于五月初向宋太宗投降，自此北汉归宋，完成了局部统一。

趁此雄威，宋太宗又移师辽南京幽都府，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但是由于宋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加之辽军坚守幽州等待来援，最终

宋军在辽军的夹击下大败，以致宋太宗中箭乘驴车逃去。宋太宗兵败后于心不甘，于是在 986 年又再次大举进攻，兵分东、中、西路。作战伊始，宋西路军进展神速，连克寰、朔、应、云四州，中路亦攻占了蔚州，东路也攻取了涿州。但辽将耶律休哥设伏断绝了宋军粮草，又于岐沟关大败宋东路军，导致其他两路宋军也被迫后撤。西路军杨业由于得不到主帅潘美的支援，在陈家谷口战伤被俘绝食而死。宋太宗两次攻辽失败，使其放弃了收复燕云地区的打算，从此转入防守。此外，由于宋对西夏政策不当，导致西夏割据政权成为边患。

由于宋初统治者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导致贫富对立的情况日益严重。尤其在蜀地，农民遭受着残酷的多方掠夺。宋兵的大肆抢掠、官府巧取豪夺、地方官的苛刻搜刮，使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丧失了田园家产。因此，一场以“均贫富”为口号的农民大起义在四川境内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以王小波为首的农民起义队伍迅速壮大，王小波战死后其妻弟李顺又被推为领袖，终于在 994 年攻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面对如此形势，宋太宗极

为震惊，急派大军入蜀招抚。在强大的官军面前，起义军英勇抵抗，但不久相继被血腥镇压。在宋初即爆发了这样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使赵宋王朝深刻认识到对内防范的重要性。因此，宋太宗也转而以主要力量防备内部的篡权夺位，而对外只是消极防御但求相安无事了。

宋取守势后，辽却加紧进攻。其不停地侵犯边境，烧杀掠夺。999年，辽兵南下，一路势如破竹，锋芒直逼开封。此



出行图（辽）

时宋太宗已死，宋真宗当政，朝廷上主战与主和两派展开争论。1004年，在新任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宋真宗被迫北上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宋、辽两军形成了相峙局面。辽之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政治讹诈为目的，入侵后遇到挫败即愿议和。这恰好也符合宋真宗的想法，即只要辽军尽快北撤可以不惜代价。于是当年十二月，宋、辽达成和议：（1）宋朝每年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2）沿边州军各守边界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3）双方不得建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还约定宋、辽以兄弟相称，这就是“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订立，使辽得到了不少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对宋来说则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这一盟约结束了宋、辽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宋、辽边境得以长期相安无事。两年后，宋又

册封西夏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自此，宋、辽、西夏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

宋朝建立之初，即实行多项制度改革，为的是扭转晚唐五代以来臣强君弱的恶习，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力度。在军事方面，首先，禁军改由三衙分掌。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后，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三个机构掌管，称为“三衙”。“三衙”的长官称为“三帅”，分统禁兵，互不辖制。“三帅”及其主要部下都由皇帝任免，都只对皇帝负责。

其次，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三衙”虽然分别统率禁军，但无调兵权和发兵权。“三衙”平时负责对禁军的管理、训练，但无权调遣军队。调遣军队的权力在枢密院，而枢密院却不直接掌管部队。“三衙”和枢密院互相牵制，都无法利用军队政变，就使军队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再次，使京城驻军与外地驻军保持均衡。宋初有禁军 20 多万，宋太祖把一半部署在京城，一半分散到地方，这就使其互相制约，不敢贸然兵变。同时禁军由精壮士兵充任，而老弱者归于地方厢军，这也起到一些互相牵制的作用。另外，北宋每遇灾荒之年，还招募大量饥民入伍，以为既扩大了禁军的兵员，又削弱了农民的反抗力量。事实上，这更加重了国家财政和百姓生产的负担。

又次，利用更戍法使兵将分离。所谓更戍，就是让禁军轮番到各地驻守，而将领也随之经常更换。这名义上是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增强军队战斗力，实际上是预防久驻一地生事，避免将领结为派系。这样，也就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隔膜状态，消除了对皇权的威胁。

末次，采用以文制武的策略。唐末五代兵变频繁，因此皇帝

原
书
缺
页



力士像（宋）

要冲；监设于矿冶、铸钱、产盐地区。州、府、军、监的长官分别称知州、知府、知军、知监，由朝廷直接委派，不能由本地人充任。此外在各州又设通判一职，通判既非知州的副职，又不是其属官，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并监督知州的行动，所发文书要知州与通判同时签署才能生效。因此，通判又称“监州”。县的长官称县令或知县，还有管户口、钱粮的主簿和管军事、治安的尉。由于唐朝以来节度使的权力往往很大，其把持地方财富很少上交中央朝廷，宋初则削去节度使实权，为控制地方将全国分为十

道，太宗时又改为十五路。各路大体上有四司：经略安抚使司，掌一路兵民之事，简称“帅司”；转运使司，掌一路财赋，简称“漕司”；提举常平司，掌一路常平仓、义仓、赈灾事，简称“仓司”；提点刑狱司，掌一路刑狱，简称“宪司”。因其长官安抚使、转运使、提举常平、提点刑狱兼有监督地方官吏之责，所以此四司亦合称“监司”。这样，宋朝中央通过通判限制、分割知州的权力，又有监司控制地方的财、军、法权，使各地方政权不得擅自妄为，有效地扭转了唐五代以来的割据势头，强化了中央集权。

再次，为防止某些官员长期掌权，结党营私，以致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宋朝还实行官衔与实职分离的官吏任用制度。宋初接受了后周的整套官僚机构，诸多官僚也得以继续留用，这无疑对取得后周官僚支持、稳定宋初的局势大有好处。但是这些旧机

构和旧人员远远不能适应新政治和新形势的需求,而且在宋朝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功臣宿将也难免权力过大私欲膨胀。因此,宋太祖改革官制,实行“官、职、差遣”制度。官即官名,如尚书、侍郎之类,只是一种虚衔,作为叙级定薪之用。职亦称职贴,是授予一部分文官的荣誉衔,并无实权,如翰林、直阁之类。只有差遣才是官员所担任的实际职务,故亦称职事官,一般在所担任职务之前冠以“判、知、权、管勾、提举”等字眼,如判寺事、知州、提举常平等。这样一来,就逐步形成了官与职、名与实的分离,打破了唐代以来官高权重不易控制的积习,但也造成后来官僚人数越来越多的恶弊。

又次,宋初为加强中央集权,还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宋太祖十分重视文化,鼓励世人读书仕进。他接受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祸乱天下的教训,又迫于急需大量文治人才分理庶务的要求,采用各种方法提高在职官员的修养,并通过逐步扩大科举录取名额的措施以补吏员之不足。宋太祖曾深有感触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宰相赵普在宋太祖规劝下勤学自勉,文武百官也以不学无术相耻。此后儒臣文士在朝中占据要职的日益增多,地方上也形成了“文臣为大帅,武臣副之”的定例。但是宋太祖在建隆元年(960年)恢复科考以来,同时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引导和控制。如废除公荐制度,禁止称考官为师门、恩师,确定殿试制度,实行糊名、弥封、誊录、锁院、别试、唱名等措施。这就使考试更为公平,限制了势家子弟徇私舞弊、把持科场的特权,使一大批寒俊庶士得以通过考试跻入仕途。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宰相李昉、参知政事吕蒙正、盐铁使王明、度支使许仲宣,均有子弟及亲近举进士入等。宋太祖认为:“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①随后全部罢免其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